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周书灿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关键词]杨宽;古史演变分化说;《穆天子传》;信古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2.018

一、杨宽“古史演变分化说”的提出及重要论点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1〕}

据古史传说之史料及史学常识以比较推断,其渐次演变分化牵合之迹,实有规律可寻,循环论证,无有不可得其会通者。其非偶合明矣!吾人为培植新古史学之基础,即不能不于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作一番澄清之开导工作,以探寻传说演变分化之系统,为古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非云破坏古史,实为建设古史耳。盖三皇五帝尧舜禹等之出于神话,具有明确之直接证据,苟将前后之史料排列比较,已甚了然,初不待辨而自明,惜乎世人囿于成见之深也!^{〔2〕}

杨氏还结合我国远古时期的各种传说论及:

盖古史固多出于神话,而神话之来源有纯出幻想者,亦有真实历史为之背景者。吾国古史传说,如盘古之出于犬戎传说之讹变,泰皇、天皇、地皇之出于“太一”与天地阴阳之哲理,黄帝出于

作者简介:周书灿,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本文系贵州省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一般课题“现代学术思潮与多学科视野下的《穆天子传》研究”(20CGZX16)的阶段性成果。

“皇帝”之音变,本为上帝之通名,此皆纯出虚构。至若帝俊、帝喾、大皞、帝舜之为殷人东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话,少皞、羿契之为殷人东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话,益、句芒之为东夷之鸟神及祖先神话,鯀、共工、玄冥之为殷人东夷之河伯神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之为殷人东夷之火正神话,王亥之为殷人东夷之畜牧神话;又若颛顼、尧之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话,禹、句龙之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话;则皆由于原始神话分化演变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会之史影存乎其间。^[3]

杨氏对古代文献中古史传说的流变进行细密考察后指出:“吾人汇集先后之传说,比较其异同,并由语音以求其分合之关键,则纷然杂陈之古史传说,可以澄清见底矣!”^[4]“考辨古史传说之方法,贵乎比较其先后异同,异中见同,同中见异,究其分化融合之经历,然后古史传说之真相可得而明。”^[5]关于古史传说的产生和演变,杨氏继续论及:

古史传说之先后发生,自有其层累,亦自有其演变发展之规律,非出向壁虚造,庙号与神祇称号之混淆,实为神话转变为古史之主要动力,此多出自然之演变;智识阶级之润色与增饰,特其次要者耳。古史传说之产生与演变,由于无意自然者多,出于有意杜撰者少,出于时代潮流之渐变者多,出于超时代之突变者少,视大众意识而转变者多,出于一二人之改变者少。持托古改制之说者,竟谓少数诸子之力足以徧伪古史,此未免夸大其辞矣!^[6]

就在《中国上古史导论》发表的同时,杨氏在为《古史辨》第七册所作的《序》中,较早言及:“我这部《导论》,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神话学——对西汉、战国这最后两道防线,作一次突击,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进展一程的。我此后还想继续的向这方面推进,非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决不停止。”^[7]此后,在《上吕师诚之书》中,杨氏进一步讲述了其著述《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的背景和动机:

《导论》一书,仅凭思虑所及,随笔写成,宜其无当矣。生意当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难题,为殷墟卜辞之学犹未能建成一体系,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地下之新史料诚较纸上之旧史料为可贵,实物之史料诚较传说之史料为可信,但考释必须观其会通,然后能增高新史料之价值。若任情附会穿凿,其与伪造新史料,相去仅一间耳。^[8]

事实上,杨先生以上所说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出土文献研究中的穿凿附会问题,在当今学术界仍很普遍。所以,杨氏积极阐发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其学术价值,迄今并未过时。《中国上古史导论》发表后不久,蒋大沂曾盛赞该书“词锐而证密,体大而思精”,^[9]“由古史传说探索其神话之原型,有证如山,不容反覆”。^[10]蒋氏还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该书作出如下评论:

吾国古史传说,先之以自然变化,重之以人工饰伪,不特棼如乱丝,抑且以胶投漆,究诘无从,非一日矣。自顾师颉刚攘臂一呼,首发层累构成之覆,今又得吾兄集合众说,爬梳而董理之,不特饰伪之词,日以游离,即纷乱之实,亦渐克睹其条理;系统就绪,则补苴易于为力;继往开来,大著为不朽矣!^[11]

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评论未免有拔高溢美之成分。《中国上古史导论》中的若干具体论点也未必妥当,如童书业先生即曾指出,杨氏“以颛顼与尧为周人西戎之上帝,殊有问题”。^[12]针对杨氏“惟黄炎二帝为西方之上帝”的论点,童氏反驳说:“盖诸上帝皆一‘皇帝’之分化,非仅黄帝为然也。”^[13]蒋大沂指出,《中国上古史导论》“仅探索至神话而止,而与神话之初相以及神话之历史背景,则犹未暇论列”。^[14]但总的来看,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当时还是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0年8月14日,在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中,杨氏即曾反复强调:“《中国上古史导论》和《中国古代冶铁

技术发展史》……这两种书正是我著作中特别重要的。”^[15]“《中国上古史导论》是我早年的代表作，四十年代不仅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而且在外国学术界有深远影响。”^[16]杨氏还特别提到，1946年，日本著名史学家贝冢茂树“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推动现代古史研究前进途径，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17]的评论，“主要就是指这部《中国上古史导论》而言的”。^[18]杨氏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

二、《〈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的创作背景与写作动机

1996年，杨宽先生《〈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发表。关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的著述动机和写作背景，我们获得的信息并不多。1995年12月13日，杨氏在致王孝廉的函中提道：“关于古神话方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写，例如一九四二年长沙楚墓所出土的《楚帛书》（或称《缙书》）上二段文字所谓的创世神话，很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活跃起来。”^[19]在1996年4月3日致王孝廉的函中继续说到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帛书》“伏羲和祝融开天辟地的神话”^[20]问题，并希望王氏“能搜集世界上各民族太阳神开天辟地的神话加以比较”，^[21]“写成一篇很出色的论文”。^[22]1996年5月4日致王孝廉的函中仍谈到伏羲皇帝的传说的问题，此封信中首次提道：“最近写了论《穆天子传》一文，已寄往上海，尚不知何时能刊出。”^[23]在此期间，杨氏反复强调：“忙于修订《战国史》一书”，^[24]迄1996年6月25日，杨氏在致王孝廉的函中写道：“我已写成《〈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送往上海。”^[25]由此大致可以获悉杨氏《〈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的创作背景。也就是在这封信中，杨氏陈述了《〈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的主要观点：

《穆天子传》一书，我认为真实的。这是战国初期魏国史官依据河宗氏口头流传所讲的祖先伯天引导周穆王西游河源的传说。周穆王之西行，当如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史记·六国表》）相同。“游戎地至河上”，当由一些戎族首领引导保护送行的，河宗伯天即是其中一人。……正因为这是依据河宗氏祖先传说，此中所述及人物都是真实的。……河宗氏自称河伯后裔，有关于河伯的神话，是可以理解的。^[26]

从以上文字大体可以看出，杨氏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从其屡屡论及“《穆天子传》一书，我认为真实的”，“正因为这是依据河宗氏祖先传说，此中所述及人物都是真实的”，则大体可以看出，杨氏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果此前如贝冢茂树所称，作为古史辨派第二代学者的杨宽，开拓出“新释古派”的境地，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杨宽先生反反复复强调古代文献和传说的“真实”，则似乎感觉到，其与早期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杨氏《〈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或与撰写《西周史》著作有直接的关系。1997年5月1日，杨氏致王孝廉的信中提道：“我已将《战国史》（增定本）稿寄给他（按：指吴继文），同时他又热忱许诺继续出版我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约七十万字）和《西周史稿》以及《论文集》，这些稿件我正在陆续复印中，待复印完成，亦将陆续寄给吴先生。”^[27]同年6月16日，杨氏在致王孝廉的函中再次提道：“拙作《战国史》（增定本）将于十月出版，拙作《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将于明年五月出版，其工作的认真负责，进行极其迅速，这是先生大力推荐和吴先生特别努力的结果。并蒙许允，拙作《西周史稿》与《论文集》将继续出版，《西周史稿》将于下星期寄往台北。”^[28]在1997年10月致王孝廉的函中说：“正在继续补充修订《西周史稿》一书，这又是一项草创工作，亦已约定，待定稿后送请两地出版两种版

本。”^[29]迄1999年10月12日,杨氏在致孝廉的函中明确说道:“我的《战国史》增定本在台北出版之后,《西周史》很厚一册也已在台北出版。”^[30]综上所述可知,自1996年开始,杨宽先生一直忙于《战国史》增订本、《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和《西周史》及《论文集》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杨氏自称,“目前我要做的,是一个总结工作,也是个结尾工作。”^[31]从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周史》一书的章节结构看,《〈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专门列入《西周史》的一章,显然,《〈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和《西周史》的撰写是齐头并进的。

三、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看杨宽学术思想的变化

综前所论,杨宽先生《〈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从撰写到发表,时间颇为短暂,但对《穆天子传》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如在该文引言部分,杨氏讲道:“为什么战国时代成书的这个周穆王西游的神话传说中,会保存有西周的史料与当时中西交通的史迹而不见于其他先秦文献中?为什么此书会有如此独特的史料价值呢?我曾经长期考虑过这个问题。”^[32]在《〈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杨氏从学术史角度简要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穆天子传》著作年代和史料价值的争议情况。而从以下《河宗氏祖先神话传说的真实性》《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关于昆仑和县圃神话的来历》几节的标题看,杨氏对于《穆天子传》各种传说及所述历史的“真实性”的强调,应该是受到了杨树达、唐兰据班簋铭文判定《穆天子传》“固亦有所依据,不尽为子虚乌有虚构之说也”,^[33]“毛班见《穆天子传》,此书虽多夸张之语,写成时代较晚,但除盛姬一卷外,大体上有历史根据的,得此簋正可互证”^[34]之启发。杨氏所举“近来不少学者确认此书作于战国时代,同时又确认其中既具有西周史料,又反映了先秦中西交通及其沿途部族分布的史迹”^[35]的观点,大体上也是杨氏对于《穆天子传》著作年代及其史料价值的基本意见。

20世纪40年代,杨氏积极阐发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呈现出比信古、疑古、考古、释古等新史学流派更为独特的旨趣。这从《中国上古史导论》开篇的议论文字中可见一斑。杨氏首先谈到其对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各派的基本意见:

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近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史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十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未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36]

从以上文字可知,杨氏除了认为信古一派不科学外,对疑古、考古、释古各派的学术思想基本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并非不加分析地简单肯定或否定。

关于疑古,杨氏曾作以下论述:

史学之方法,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咨访与考证批判,考证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加固有之史料,仅能淘汰虚妄之传说;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观念,仅能肃清错误之成见,故其所得之成绩,多属破坏而不在建设。……上溯史料之来源以探求事实之真相乃治史者最先必经之步骤,此疑古之说之所以尚也。^[37]

关于考古,杨氏亦发表有以下较为独到的见解:

传说之史料,多属滋生,相传愈久,讹谬愈多,演变亦愈甚,且皆形诸笔墨,又多有意传世,不免有造作虚伪之处。地下实物之史料,多属原始,又多无意传世者,自较纸上之史料为可靠。然古器物在当时本为应付人生之需要者,类多无意传世,欲据少数器物以推论前人活动之全部,实非易事。必有极丰富之实物,比较其大量异同而探求其演化之迹,然后能得梗概,此考古发掘之所以尚也。^[38]

最后,杨氏还论及释古:

历史家之任务,本在研究具体之历史,既得真实之史料,自当据科学史观或整个历史过程学说以为概括之解释,此释古之说之所以尚也。^[39]

在以上论述基础之上,杨氏指出:“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40]综前所论,杨氏认为疑古、考古、释古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显然,在杨氏看来,考证批判史料,比较材料异同,概括解释史料,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新史学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面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杨氏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中说:“《古史辨》发展到了现阶段,我们认为已有了飞跃的进步,在长夜漫漫中已经找到了曙光。”^[41]杨氏对20世纪以来的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并非不加分析地简单吸收,而往往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融通。杨氏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有着准确的认识:“原夫史学之研究,基于史料,无史料,斯无史学矣。”^[42]杨氏的这一见解简直就是梁启超“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43]及徐中舒“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之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44]文字的翻版;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杨氏的这一观点,和史料派大师傅斯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45]“史学的工作便是整理史料”,^[46]“史学便是史料学”^[47]的学术思想,呈现出不同的旨趣。此外,杨氏对王国维先生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中存在的问题,^[48]及科学史观传入中国后学者以社会形式解释古史传说产生的混乱,^[49]提出一系列质疑与批判。综上可知,杨氏自称:“余之治古史学,本无家派之成见存于心”,^[50]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杨氏将其释古的学术思想简单概括为:“仅依据一般史学方法之步骤以从事而已,初唯取先秦古籍有关古史之材料,类而辑之,而比察其异同,久之乃知夏以上之古史传说类多不可信,又久之而后知晓传说之来源出于神话。”^[51]总的来看,杨宽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与疑古、考古、释古等新史学流派的学术思想,相互影响,异中有同。但可以颇为清楚地看到,杨氏对于信古派的学术思想则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杨氏在《〈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引言部分,主张“沟通从西周至战国的历史脉络,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眼光来分析”,^[52]才能从中找出《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杨氏明确阐发其独到见解:

这部书所以会有真实的史料价值,由于作者采自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他们从西周以来,世代口头流传着祖先河宗栢夭参与周穆王长途西游的神话传说,……直到战国初期才被魏国史官采访所得,成为《穆天子传》的主要内容。这种原始的游牧部族所传的祖先历史,本来是和神话传说分不开的。^[53]

为进一步论证《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杨氏首先分析了河宗氏祖先神话传说的“真实性”问题。杨氏指出:“河宗氏是以河伯之神作为始祖而崇拜的宗族,是游牧于黄河上游的一个大部落。”^[54]“河宗氏所崇拜的河伯潜居在阳纒之泽,正与秦、晋的神话相同。”^[55]杨氏由此断定“河宗氏祖先神话传说的真实性”。^[56]杨氏以为,《左传》等文献所记怀姓“九宗五正”,“是西周王朝为了安抚狄族首领而授予的官职”,^[57]“引导周穆王西行的河宗栢夭,原是黄河上游游牧部族河宗氏的首领,亦是狄族,

这一带在西周、春秋时,原是狄族的游牧地区,河宗氏当是狄族的部落。由此也可见河宗栢夭引导周穆王西行记载的真实性。”^[58]杨氏推测,《穆天子传》的成书背景:“战国初期魏文侯变法图强,攻占了秦河西之地,又略取戎狄之地,先后建立河西郡与上郡。河宗氏的一部分当有留在魏国境内的。估计河宗氏长期流传的这段有关祖先的光荣传说,这时为魏国的史官采访所得,作为周穆王的史料,并有所补充,而编成此书。”^[59]

接着,杨氏继续论证“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问题。杨氏认为周穆王西征之事是“真实的”:“周穆王在几个游牧部族的引导下,带着所谓‘六师之人’,沿着黄河上游西行,穿越戎、狄地区,经历许多戎狄部族,相互赠送礼品,做安抚的工作,都是真实的故事。其中掺入神话传说,或有夸张增饰,当然是无可避免的。”^[60]为进一步论定周穆王西征“是真实的故事”,杨氏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如下分析:“先秦时代西北地区分布有许多戎狄的部族,中原的王朝或诸侯,企图兼并这些部族和扩大统治地区,不外乎两种手段,或者用安抚的策略,或者用武力征服,或两者兼而用之。周穆王是兼用两种策略的。”^[61]“《穆天子传》所说酈,当即《赵世家》溷之貉族。”^[62]杨氏继续强调:“先秦的历史上,赵武灵王所设九原、云中二郡,已经是西北最远的地方,因此我们以中原文献与《穆天子传》所载西征地名能够参证的,只能到此为止。从此已可见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63]杨氏以为《左传》昭公十二年左相史倚对楚灵王讲的一段话和《国语·齐语》《管子·小匡》一语,“足以证明周穆王西征的真实性”。^[64]

再往下,杨氏又极力论证“《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65]杨氏指出,“《穆天子传》主要叙述穆王西征历程,述及周初其它的事不多。但是所述及的事很正确,可以纠正《史记》的错误”。^[66]杨氏注意到,《穆天子传》“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之记载,和《史记》不同。杨氏以为,《史记》所记吴太伯逃奔之说,“是出于误传”,^[67]《穆天子传》所述太王封太伯于吴(即虞),“真是正确的事实”。^[68]杨氏还指出,《史记·周本纪》把太王(即大王)称为“古公”或“古公亶父”“是错误的”,^[69]《穆天子传》称为大王亶父,“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据以改正《史记》的错误”。^[70]杨氏还论及:“《穆天子传》记载河宗栢夭向赤乌氏首领传达周穆王的讲话,讲到大王亶父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元子太伯封于吴(即虞),二是把元女嫁给赤乌氏首领,用以说明‘赤乌氏先出自周宗’。既然封元子之事确是事实,那么,嫁元女给赤乌氏也应是事实,而且与封元子之事同样重要,因而相提并论。”^[71]

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杨氏回答了“《穆天子传》所叙穆王西征历程,既是真实的史迹,为什么其中充满了神话色彩”^[72]的问题:“这是因为传说者是河宗氏游牧部族的人,他们自认为是河伯之神的后裔,河出昆仑又是他们信仰的传说,……由于这个穆天子西征史迹,河宗氏世代口头相传,直到战国初期为魏国史官采得而记录,传说者所传的神话,就不免要掺入战国时代神话的特点。原为游牧部族的河宗氏历代相传的祖先传说,理所当然地和神话相结合,这正是它真实的来历,这是战国时代中原的文人学士所想象不到的。”^[73]

综上所述,杨氏《〈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并没有放弃此前其积极主张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然而颇可注意的是,该文中,杨氏反反复复强调《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等。而这些“真实”“正确”,很容易让人想到,迄20世纪90年代末,杨氏对于古史古书的态度逐渐转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其极力反对的“动谓战国、秦汉之书近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的信古倾向,而与该阶段中国大陆学术界风行的“走出疑古时代”思潮,颇有一些不谋而合或不期而同。

综前所论,不难发现,杨氏有关《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

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一系列论述与其前所积极倡导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与此同时,杨氏《〈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中的若干问题,也不断引起学术界注意。兹分别举证如下:

如按照杨氏的解释,《穆天子传》“采自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这一推论显然先入为主地建立在《穆天子传》来历“真实”、周穆王西征史迹“真实”等判断基础之上。然而,何以证明河宗氏是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杨氏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证据材料,而只是进行一些大胆的推测。杨氏分别论及,战国初期,龙门以上,黄河上游还是个戎狄部族的“游居”地区。^[74]霍太山山神预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攻取得林胡之地,还能占有河宗之地,直到休、溷诸貉之地”,“后来都成为事实”。^[75]河宗氏“所重视的神灵之地,主要是阳纒和龙门”。^[76]“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引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的话,古代河套有个大湖,当即阳纒,阳纒之山当在湖的北面。”^[77]然后,杨氏用简单类比的方法,由“河宗氏所崇拜的河伯潜居在阳纒之泽,正与秦、晋的神话相同”,^[78]从而判定“河宗氏祖先神话传说的真实性”。^[79]显然,以上论述很难构成有说服力的证据链,也给人们带来诸多难以回答的疑问。

杨氏运用简单比较的方法,如其由“(秦惠王、秦昭王)先后越过戎族地区,到北河去视察,说明了他们对黄河的关心和重视”^[80]推测:“看来周穆王也是如此,同样是越过戎狄地区而游观黄河上游,只是规模要大得多,路程要远得多。”^[81]笔者实在不知,由“(秦惠王、秦昭王)先后越过戎族地区,到北河去视察”如何能够证明周穆王“同样是越过戎狄地区而游观黄河上游”的假说?很显然,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因此,杨氏所反复强调的“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就不能不令学者产生怀疑。

中国远古时期有所谓大禹“万国”、^[82]商汤“诸侯三千”^[83]的传说,《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84]整个春秋时期的情形,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85]诸侯国数量不断减少,司马迁已经说出了主要原因:“诸侯力攻相并。”而杨氏所说“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历经6—7个世纪,河宗氏的族氏组织难道一直保存着,人群没有混融,社会组织没有变动?如果人员混杂,族氏组织解体,其祖先神话传说还能完整流传下来?如果河宗氏在列国兼并的战争中,族氏组织解体,人群混杂,在古代“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86]的传统下,迄战国时期,周人的历史,“盖自周贞王以后,国史散佚,文献无征,故无可考”,^[87]河宗氏祖先传说是否还能真实完整地保存下来,颇为值得深思。又如,由“河宗氏所崇拜的河伯潜居在阳纒之泽,正与秦、晋的神话相同”进行简单类比,从而判定“河宗氏祖先神话传说的真实性”,是否需要获得直接的证据支持?

杨氏仅仅根据《史记·封禅书》所记胡巫祠及1976年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乙区遗址中出土两个蚌雕人头像为据,就断定“这两个人头像是‘胡巫’是无疑的”,^[88]并进一步判定:“胡巫从西北来到中国的都城为执政者所使用,已有悠久的历史了。从西周初期已经开始,汉代初年皇帝使用胡巫,是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传统的。”^[89]以下,杨氏又进一步推断:“胡巫是乌孙的可能性较大”,^[90]“西周的胡巫也可能同样是乌孙来的”。^[91]事实上,杨氏的以上结论,完全是建立在缺乏直接证据的主观推测基础之上,因而很难令人信服。又如,上举杨氏由大王亶父“既然封元子之事确是事实”,从而断言:“那么嫁元女给赤乌氏也该是事实,而且与封元子之事同样重要,因而相提并论”,显然同样疑点重重,难以令人信服。杨氏认为,王贻樾认为赤乌氏可能即乌孙氏,乌孙氏原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这个推断“可能性很大”,^[92]然而乌孙的史迹,较早也仅仅自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方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汉

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93]“西域以孝武时始通”。^[94]唐代学者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95]迄张骞出使西域时，《汉书·西域传》仍讲道：“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96]再往后方有遣汉代公主嫁乌孙的记载：“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97]以上材料表明，迄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方与乌孙之间通使联姻，将这一关系上溯至早在周王朝建立之前，并断言公亶父嫁元女给赤乌氏“也应该是事实”，显然极其主观武断。

综上可知，杨氏的学术思想很明显有一个从“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向着信古的方向转变的过程。杨氏的一系列论述，屡屡暴露出一系列证据缺乏，推断多于考证，结论武断等突出问题。凡此表明，其学术思想呈现出一定的倒退之势。

注释：

[1][2][3][4][5][6][12][36][37][38][39][40][42][48][49][50][51]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9、69、70、102、106、148、154、65、65-66、66、66、66、65、66-67、67-68、68、68页。

[7][41]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杨序”，第2、1页。

[8] 杨宽：《上吕师诚之书》，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下）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1页。

[9][10][11][13][14] 蒋大沂：《与杨宽正书——〈中国上古史导论〉之讨论》，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下）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

[15][16][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杨宽著，贾鹏涛整理：《杨宽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2、152、152、65-66、55、67、67、69、67、72、72、78、79、80、81、79页。

[17][日] 貝塚茂樹：《中国古代史学の発展》，东京：弘文堂书房，1946年。转引自杨宽著，贾鹏涛整理：《杨宽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2-153页。

[32][35][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8][89][90][91][92]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4、604、604、604、605、606、606、608、608、608-609、609、613、613、614、614、614、614、615、617、618、618、619、619、604-605、605、605、606、606、606、610、610、621、621、621、621、610页。

[33] 杨树达：《毛伯班簋跋》，《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卷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34]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3页。

[43] 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44]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册，1936年。

[45][46][47]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2、242、243页。

[82] 《庄子·天下》说：“昔者，禹之湮洪水也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清]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17页。《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米帛者万国。”[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63页。

[83] 《战国策·齐策四》：“及汤之时，诸侯三千。”[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9页。

[84][85][汉]司马迁：《陈杞世家》《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三十六、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86、3297页。

[86][清]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页。

[87][清]崔述撰，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6页。

[93][94][95][96][9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西域传》，《汉书》卷九十六（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3871、3901、3902、2903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